

方孝孺與婺州文人集團

歐陽光*

一、緒言：從方孝孺被誅十族談起

在明初政壇、文壇上，方孝孺都是不容忽視的人物。建文帝（1399-1402）時期，孝孺任文學博士，深受信任，是建文新政的主要謀劃者；他學術醇正，被許為「程朱復出」、¹「有明之學祖」。² 其為文「縱橫豪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³ 為明初散文大家之一。

熟悉方孝孺生平的人，都知道他在「靖難之役」中因拒絕為成祖朱棣（1403-1424）起草登極詔書而被誅十族的慘烈一幕：

成祖欲草即位詔，皆舉孝孺，乃召出獄，斬袞入見，悲痛徹殿陛。……左右授筆劄，又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聲愈厲。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初，籍十族，每逮至，輒以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謫戍絕徼死者不可勝記。⁴

* 廣州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¹ 清·黃宗羲：〈師說〉，《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

² 同注1，卷43〈諸儒學案上〉，頁1045。

³ 清·永瑆等：〈遜志齋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1480。

⁴ 清·谷應泰：〈壬午殉難〉，《明史記事本末》卷18（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291。

所謂「誅九族」，在中國歷史上代不乏見，而將朋友門生歸為一族，與九族同誅，不能不說是明成祖首開之惡例。對此，前人多感歎此種株連的血腥、殘酷，卻較少進一步去深思這一現象所昭示的社會文化意義。筆者以為，「誅十族」現象的出現，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師弟子淵源授受關係以及以師緣為紐帶的朋友關係，已經成為封建社會諸種人際關係中最重要之關係之一。唐以前，人們臧否品評人物主要著眼於人物的家世門第，宋元以降，看重的則是人物的師承授受。⁵南宋時朱熹撰《伊雒淵源錄》，強調道學淵源傳承，「蓋宋人談宗派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⁶後來黃宗羲、全祖望等修《宋元學案》，每一學派下別分講友、學侶、門人等目，以明師承源流，都反映了這一社會風氣的轉移變化。宋元以降，在師緣、友緣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文人群體不僅大量出現，而且在政治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生活在這一社會文化環境中的文人，其思想行事無疑受到來自師友以及群體方面的越來越大的影響。研究這一時期的文人，亦不能不對此一方面予以特別注意。正是基於這一思路，本文擬對方孝孺與婺州文人集團的關係作一初步考察。

⁵ 明·宋濂：《宋學士全集》，卷10〈胡長孺傳〉云：「長孺之學，出於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順齋處士同邑王夢松，夢松事龍泉葉文修公味道，味道則徽國公朱熹之弟子也。考其淵源，亦有所自哉。」（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頁359。王禕：《王忠文集》，卷14〈元儒林傳〉云：「朱氏之徒亦眾矣，得其宗者唯黃榦氏。榦傳何基氏，基傳王柏氏，柏之傳為履祥、為謙，其授受淵源如禦一車以行大遠，如執一籥以節眾音，推原統序必以四氏為朱學之世適，亦何其一出於正粹然如此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明人文集叢刊本，1991），頁302。像這種一談人物就上溯其師承淵源，判別其門庭的例子，在宋元人著作中可謂俯拾即是，不勝枚舉。

⁶ 清·永瑤等：《伊雒淵源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519。

二、方孝孺與婺州師友。

明太祖（1368-1398）洪武十年（1377），孝孺時年二十一歲，赴浦陽承學於宋濂之門，至洪武十三年（1380）二十四歲時返鄉，在浦陽共生活了四年。他與婺州師友的交往主要是在這一時期。

在此期間，對孝孺影響最大的首推他的老師宋濂。其實，早在前一年，宋濂仍在京任職翰林時，孝孺即銜父命，以文為贄，赴京謁見宋濂。宋濂「一覽輒奇之，館真左右，與其談經，曆三時乃去。」⁷ 後來，孝孺因父不幸去世，與宋濂暫別。次年，宋濂致仕還鄉，孝孺祥禫未終，既遵父遺命，為追隨宋濂來到浦陽，繼續未竟的學業。

方孝孺拜宋濂為師乃是慕其大名：「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為然」，⁸ 故「求學者舍婺無所往」。⁹ 而宋濂對能將這位才華橫溢的青年收為弟子亦掩飾不住內心的欣喜：「古者重德教，非惟弟子之求師，而為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晚得天臺方生希直，其為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脫有以燭諸理。間發為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云胡不喜。」¹⁰ 他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學問傳授給孝孺：「庸言極論，莫非正學。翼孟宗韓，沿洙遵洛。」¹¹ 在宋濂的悉心教導下，孝孺「日

⁷ 宋濂：〈送門生方孝孺還鄉詩並序〉，《宋學士全集》，卷31，頁1137。案，王春南、趙映林著《宋濂、方孝孺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謂宋文中「曆三時」為「那天，這一老一少縱論古今，促膝長談『曆三時』」。筆者以為，這裏對「三時」的理解有誤。「三時」在這裏應指一年中的三個時序，而非一天中的三個時辰。宋文「館真左右」云云，方孝孺《題太史公手帖》：「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於翰林，遂受業於門。」《遜志齋集》卷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明人文集叢刊本，1991），頁531。下文凡引該集，除特別注明外，均用此本）均表明孝孺拜見宋濂後，受其賞識，即留其門下受業。據盧演《方正學先生年譜》（清同治十二年浙江刊本）孝孺於洪武九年（1376）初春遊京師，其年十月父克勤因「空印案」受牽連，含冤歿於京師，孝孺與兄孝聞扶柩還鄉，在宋濂門下恰曆春、夏、秋三個時序。

⁸ 方孝孺：〈先府君行狀〉，《遜志齋集》，卷21，頁588。

⁹ 方孝孺：〈與鄭叔度八首〉，《遜志齋集》，卷10，頁298。

¹⁰ 宋濂：〈送方生還天臺詩序〉，引自《遜志齋集》〈附錄〉，四部叢刊本，頁3-4。

¹¹ 方孝孺：〈祭太史公五首〉，《遜志齋集》，卷20，頁568。

有所進而月有所獲」，¹² 「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宋濂曾這樣評價孝孺：「凡理學淵源之統，人文絕續之寄，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於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以近代之言，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為後而孰為先也。」¹³ 推揚讚譽備至。而孝孺亦為能從宋濂這位當世大儒問學而感到幸運和自豪。他不只一次地表示：「某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為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為學也。……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¹⁴

宋濂曾經想招孝孺為婿，¹⁵ 此事雖未成功，但足以說明他對孝孺厚愛有加。筆者以為，宋濂對孝孺的厚愛並不僅是從私人感情出發的，更主要的是他看中了孝孺的潛質，將他作為學術的衣鉢傳人，所謂「意謂小子，可屬斯文」是也。¹⁶ 他對孝孺的培養也是著眼於此。對此，孝孺也是心領神會，並自覺以繼承乃師事業為己任。他在《謝太史公》書中說：「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憫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¹⁷

孝孺在浦陽求學期間，除了從師於宋濂之外，對他產生較大影響的老師一輩人物還有胡翰、蘇伯衡、王禕等人。

胡翰（1307-1381），字仲子，一字仲申，學者稱長山先生，金華人。明初以薦授衢州教授。洪武二年（1369）召與修《元史》，史成，賜金帛遣歸。

¹² 方孝孺：〈與葉夷仲先生〉，《遜志齋集》，卷9，頁277。

¹³ 同注7。

¹⁴ 方孝孺：〈傳經齋記〉，《遜志齋集》，卷16，頁458-459。

¹⁵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10〈與鄭叔度八首〉：「公無恙日，嘗欲收僕，申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為恨。」，頁308。

¹⁶ 同注11。

¹⁷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9，頁262。

胡翰與宋濂嘗同從師於著名古文家吳萊，而「同郡黃潛、柳貫以文章名天下，見翰文，稱之不容口。遊元都，公卿交譽之。」¹⁸ 宋濂對這位同門十分敬畏，自謂「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¹⁹ 只是因為「潛溪（宋濂號）遭時遇主，一時高文典冊，皆出其手；仲申老於廣文，位不配望，是以天下但知有潛溪，鮮知仲申也。」²⁰ 孝孺到浦陽不久，就拜見了胡翰。²¹ 胡翰對這位後學十分賞識，推譽獎掖不遺餘力，謂：「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²² 並「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²³ 對此，孝孺深受感動，他曾對友人王仲縉說：「夫長山今之賢而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者之後。使昔之大儒如虞公、黃公尚在，且當屈己避之，況眇爾小子乎！大凡先輩之於後學，以為不引而稱之，則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眾人不信，故屈己以為遜讓。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待後學之心也。」²⁴ 孝孺在浦陽求學的四十年，正好是胡翰生命的最後歲月，這一對年齡相差五十歲的師弟子，由於志同道合而結為忘年之交，也稱得上是古今師弟子友誼的一段佳話吧。

蘇伯衡，生卒年失考，約洪武二十三年（1390）前後在世，字平仲，金華人。宋蘇轍九世孫。元末貢於鄉。明初為國子學錄，遷學正。被薦擢翰林編修，力辭歸。洪武十年（1377），宋濂致仕，太祖問誰可替代，宋濂對曰：「伯衡，臣鄉人，學博行修，文詞蔚瞻有法。」²⁵ 太祖即徵之，復以疾辭。後為處州教授，坐表箋誤，下吏死。伯衡年長孝孺二三十歲，兩人來往頻密，相處頗歡。

¹⁸ 清·張廷玉等：《胡翰傳》，《明史》，卷 285（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7310。

¹⁹ 宋濂：《胡仲子文集序》，《宋學士全集》，卷 7，頁 214。

²⁰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 93。

²¹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 18〈題胡仲申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餘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華。」頁 533。

²² 方孝孺：《上胡先生二首》，《遜志齋集》，卷 9，頁 265。

²³ 同注 21。

²⁴ 方孝孺：《與王仲縉五首》，《遜志齋集》，卷 10，頁 310。

²⁵ 清·張廷玉等：《蘇伯衡傳》，《明史》，卷 285，頁 7311。

孝孺讀了伯衡的文章，讚歎其「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²⁶ 伯衡也對孝孺十分青睞，「欲屬之以斯文之重。」²⁷ 兩人分別數年後，孝孺在給伯衡的信中說：「師友遐棄，忽逾六年。緒言闊論，久絕心耳。勝遊歡會，無復曩時。每一興懷，輒俯首搏髀，情不能已。時取舊所貺遺諸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心之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黃岩林君寄至手書，發封伸紙，口誦心思，夙昔之好，乖闊之情，綢繆醇厚，宛然在目，何眷愛之隆、屬望之遠哉！」²⁸ 兩人感情之深厚於此可見一斑。

王禕（1322-1378），字子充，義烏人。明初，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後同知南康府事。洪武二年（1369）修《元史》，詔與宋濂為總裁。書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洪武五年（1372），奉使往雲南諭降，不幸遇害。初私諡文節，後改諡文忠。孝孺到浦陽時，王禕已死去多年，故孝孺有「以未識先生為恨」之歎。孝孺對這位前輩的道德文章十分欽佩，他在《王待制私諡議》中對其予以極高的評價：「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乎文辭，敷腴蔚瞻，浩乎若秋江之濤，鼓蕩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藹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²⁹ 他還親自編選王禕的文集，並為之作序。³⁰ 從中可以見出這位未曾謀面的前輩師長對他的影響。

孝孺在浦陽從宋濂學習期間，除了獲接眾多師長之外，還與同門學友稽疑質惑，講論問難，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在回憶這段生活時滿懷感情地寫道：「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恒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窮日，求以達

²⁶ 方孝孺：〈蘇太史文集序〉，《遜志齋集》，卷12，頁370。

²⁷ 方孝孺：〈與蘇先生二首〉，《遜志齋集》，卷9，頁268。

²⁸ 同注27，頁267。

²⁹ 《遜志齋集》，卷7，頁226。

³⁰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12〈華川集後序〉：「華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其子綬、紳將傳其文於世。天臺方孝孺為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為若干卷……華川者，義烏別名云。」，頁369-370。

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又能辯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眾人。」³¹ 這裏所說的給他在學術上以幫助的人，不僅只限於老師，也包括同門學友。其中與孝孺交往尤密者有劉剛、王紳以及義門鄭氏子弟等。

劉剛，生卒年不詳，字養浩，義烏人。從宋濂、胡翰遊，³² 有文聲。嘗作《明鏡歌鼓吹曲》，胡翰為之跋云：「剛此歌篇次體制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橫發，音節鏗錡，則得之潛溪，又將追踵其武，而駸駸其前矣。」³³ 剛與孝孺交情篤厚，孝孺為剛所作《像贊》，稱其：「心之蘊蓄自足以藻繪一世……是夫也，豈非今之文行君子，而古之鐵漢子孫也。」³⁴ 兩人分手後，孝孺嘗致書剛，云：「一自為別……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溪之間也。」³⁵ 今《遜志齋集》中有為剛所作文多篇，論詩如《劉氏詩序》，云：「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謂之詩。苟出乎道，有益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為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興趣極乎幽閒，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為詩哉。」³⁶ 論做人如《集義齋記》，云：「得釜庾之祿則以誇於眾，有一命之爵則喜而以為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無他，氣不充而義不明也……有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³⁷ 所言所論，無非同道間的砥礪濯磨，正是同門之本色。

³¹ 方孝孺：〈與王修德八首〉，《遜志齋集》，卷9，頁283-284。

³² 劉剛《胡仲子集後序》：「剛生也後……幸灑掃潛溪宋太史公及長山胡先生之門，俱獲受其德教。」轉引自胡翰：《胡仲子集》附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明人文集叢刊本，1991），頁136。

³³ 胡翰：〈劉養浩鏡歌鼓吹曲後跋〉，《胡仲子集》，卷8頁103。

³⁴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19，頁562。

³⁵ 方孝孺：〈答劉養浩二首〉，《遜志齋集》，卷10，頁309。案，「蘿山」、「兩溪」均為浦陽地名。

³⁶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12，頁375。

³⁷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16，頁470。

王紳（1361-1400），字仲縉，義烏人。王禕次子。幼從宋濂學，宋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³⁸ 洪武二十四年（1391），應蜀王聘，為成都府文學。建文繼位，用薦者召拜國子博士，入史館，纂修高皇帝實錄。卒於官。善文詞，有《繼志齋集》。《四庫全書提要》謂其文「濱迤豐蔚，不失家法。詩亦有陶韋風致，無元季纖穠之習。在洪武、建文之間尚可卓然成家。」仲縉少孝孺十餘歲，兩人雖系同門學友，但仲縉實以師長視孝孺，他在《簡鄭叔貞四十二韻》詩中說：「阿師正學公，長才駕濂洛。……蹇予在弱冠，共寓蘿山宅。雖號同門生，實籍師資德。叩道辱弦應，問疑承縷析。乍別書累篇，同處日甘食。契誼等弟昆，交情固膠漆。」³⁹ 他對這位兄長十分崇敬，謂其「負精純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為準繩，道德則以孔孟為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⁴⁰ 孝孺也深以能夠結識這位忠臣的後代為幸，謂其「長於尚友而不能隨俗合汙，銳於自修而恥於幹譽微寵……群乎今之士而有古人之風」，⁴¹ 「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其箕裘之業」。⁴² 孝孺不僅與仲縉同學於浦陽，後來仲縉應蜀王聘任成都府文學，孝孺時任漢中教授，亦應蜀王聘為世子傅，建文時兩人又回京任職，用藏出處大體相同，可說是浦陽學友中交往時間最長的。仲縉卒後，孝孺作文悼之，謂：「欲蹈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章逢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⁴³ 對失去這位益友深感哀痛。

孝孺之師宋濂曾長期主教於浦陽鄭氏義門。所謂鄭氏義門，是指浦陽鄭姓家族，由於十世同居，和睦相處，受到宋元兩代朝廷的旌表。該家族子弟從學於宋濂者多達數十人，其中，與孝孺關係最為密切的是鄭楷。

³⁸ 清·張廷玉等：〈王禕傳〉附〈王紳傳〉，，〈《明史》〉，卷 289 頁 7416。

³⁹ 王紳：《繼志齋集》，卷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明人文集叢刊本，1991），頁 662。

⁴⁰ 王紳：〈遜志齋稿序〉，《繼志齋集》，卷 5，頁 717。

⁴¹ 方孝孺：〈王仲縉像贊〉，《遜志齋集》，卷 19，頁 560。

⁴² 方孝孺：〈文會疏〉，《遜志齋集》，卷 8，頁 250。

⁴³ 方孝孺：〈祭王博士〉，《遜志齋集》，卷 20，頁 579。

鄭楷，生平仕履不詳，字叔度。關於兩人的關係，孝孺曾有飽含感情的描述：「去年來浦江，居太史公門，時獲過從吾兄里第。公門同序者不減十餘輩。吾兄群從中，僕識其面者亦數十人，然知僕者乃吾兄，而僕所愛敬親密無間蔽者亦莫兄若也。……吾兄聞僕所言，不待畢辭而已悉僕之意；於僕所論是非當否，不待預約而如出一口，吾兄之賢豈私於僕哉？誠道合使然也。僕知其如此，感同道者之難遇，幸而得吾兄，故傾肺腑竭愚誠盡殷勤之好，托昆弟之歡，效古君子交友之義，務為箴規劇切而至於道……故吾二人同處也必有所聞，同遊也必有所益。樂也則共慶，悲也則共戚，日夕相與，則慰憚而不自勝，一旦別來，宜乎其各不能忘情也。」⁴⁴ 這段肺腑之言將兩人之相知相契描繪得十分生動，可稱得上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朋友。《遜志齋集》中涉叔度的詩、文頗多，內容大抵以闡道翼教為旨歸。正如孝孺所強調的那樣，他們的親密感情是建立在「道合」的基礎之上的。

以上，我們對方孝孺與婺州文人的交往作了初步考察。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以上的考察並非一般的交遊考，我們的意圖在於將方孝孺納入婺州文人集團之中，並聯繫這一集團與明初政治的關係，試圖揭示出其被明成祖誅十族的更深層的原因。

三、婺州文人集團及其學術特色

所謂婺州文人集團，乃是指自宋末元初以迄明初洪武、建文年間在浙東婺州地區自發形成的一個區域性文人群體。最初的創始人是宋遺民方鳳、吳思齊、謝翱等人。他們在宋亡之後堅持遺民氣節，創作了大量詩文，一寓其黍離麥秀之思，忠懷激憤，真情滂沛，使「浦陽之詩為之一變。」⁴⁵ 他們還舉辦月泉吟社，「以東籬北窗之風，抗節季宋」，⁴⁶ 東南一帶士人風起響應，參

⁴⁴ 方孝孺：〈與鄭叔度八首〉，《遜志齋集》，卷10，頁303。

⁴⁵ 宋濂：〈方鳳傳〉，《浦陽人物記》，卷下（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頁240。

⁴⁶ 全祖望：〈跋月泉吟社後〉，《鮚埼亭集外編》，卷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1439。

加者達二千餘人。⁴⁷ 在他們周圍，聚集了大批追隨者。其佼佼者有黃潛、柳貫、吳萊等人。方鳳等辭世後，黃、柳、吳等人影響日大。黃潛於延祐二年(1315)中進士第，後來官至翰林侍講學士；柳貫曾任江西儒學提舉、翰林待制等職。黃、柳與揭傒斯、虞集等並稱為「儒林四傑」。吳萊亦有文名於當世。⁴⁸ 他們因同門的關係而交往密切，形成了該集團的第二代。黃、柳、吳等人均講學授徒，宋濂、王禕、胡翰、戴良等都出自其門下，由此又形成了該集團的第三代。清人朱琰云：「浦陽方韶卿（案方鳳字韶卿）與閩海謝翱、括蒼吳子善（案吳思齊字子善）為友，開風雅之宗。由是而黃晉卿（案黃潛字晉卿）、柳道傳（案柳貫字道傳）皆出其門，吳淵穎（案吳萊私諡淵穎先生）又其孫女夫……此金華詩學極盛之一會也」。⁴⁹ 清·吳偉業云：「浙水東文獻，婺稱極盛矣。自元移宋鼎，浦江仙華隱者方鳳韶卿，與謝翱皋羽、吳思齊子善庚和於殘山剩水之間，學者多從指授為文詞。若侍講黃公、待制柳公、山長吳公，胥及韶卿之門，出而緯國典、司帝制，擅製作之柄。景濂（案宋濂字）親受業於三公，承傳遠而家法嚴，遂以文章冠天下……世皆慕之為名宗公，而不知淵源於宋之逸老。」⁵⁰ 將該集團代代承傳的線索清晰地描繪了出來。不難看出，這乃是一個由師弟子間的傳承為經、以鄉緣、師緣以及建立在師緣基礎上的友緣為緯，聯繫緊密，傳承久遠的典型的區域性文人集團。

方孝孺雖然不是婺州人，但他拜宋濂為師，並長期在婺州生活，從上面所介紹的他與婺州師長、學友的關係來看，實際上已經自覺融入了該集團之中。宋濂、胡翰、蘇伯衡等對這位天資聰穎勤奮好學的門生青眼有加，謂其「可屬斯文」，即欲傳衣鉢之意，而同門學友對他無不敬佩推崇。本身的素質、師長

⁴⁷ 清·永瑤等：〈月泉吟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1703。

⁴⁸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淵穎集〉謂吳萊「在元人中屹然負詞宗之目」、「開明代文章之派」，頁1442。

⁴⁹ 清·朱琰：〈序例〉，《金華詩錄》。轉引自方勇輯校《方鳳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頁233。

⁵⁰ 清·吳偉業：《補未刻遺集序》。轉引自宋濂《宋學士全集》附錄卷1，頁1638。

的提攜、同輩的擁戴，同時具備了以上條件，這就使其成為該集團第四代的當然傳人。

婺州地區自南宋以來就是學術重鎮，有「小鄒魯」、「東南文獻之邦」之譽。王禕在談到婺州學派紛呈的情形時說：

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為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為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為可為。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家……然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為道學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同異。其高第弟子曰勉齋黃氏，實以其學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吾婺人，論者以為朱子之世適。⁵¹

在這種學術氛圍的薰陶濡染之下，婺州文人集團形成了自己的如下學術特色：

首先，在學術思想上，受朱學影響極深，⁵² 奉朱學為正宗，以闡道翼教為宗旨。同時，也不排軋詆斥其他學說，而是雜采旁搜，兼取眾長。像該集團之集大成者宋濂，一方面服膺朱學，「究極朱子之精微」；⁵³ 同時，對呂祖謙也十分推崇，謂：「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⁵⁴ 他與同門王禕以「學呂者」互勉，所作《思媿人辭》，集中表達了繼承發揚呂學的志向。對朱熹所鄙棄的陳亮事功之學，宋濂也取相當通達的態度，認為「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而易行」。⁵⁵ 這種泛觀廣接，博採眾長的開放心態，使他們能夠得到多家學說營養的滋潤，形成明理躬行，務實致用的學風。該集團與那些徒知記誦的

⁵¹ 王禕：〈宋景濂文集序〉，《王忠文集》，卷5，頁89-90。

⁵² 方鳳與許謙交好，許謙《白雲集》中有與鳳唱和之作多首。柳貫嘗從金履祥學經（宋濂《故翰林待制……柳先生行狀》，《宋學士全集》卷25，頁908-912）。吳萊曾得到許謙的指授（《淵穎集》卷7《白雲許先生哀頌辭》：「而君平日遇予極厚。」文淵閣四庫全書，頁137）宋濂曾從聞人夢吉學經，而夢吉之父詵為王柏之弟子（鄭濤《潛溪先生小傳》，《宋學士全集》附錄卷2，頁1688）。

⁵³ 同注50，頁1638。

⁵⁴ 宋濂：〈思媿人辭〉，《宋學士全集》，卷29，頁1059。

⁵⁵ 宋濂：〈喻品傳〉，《宋學士全集》，卷10，頁335。

「章句之儒」的一個極大不同，即反對空談性命，主張學以用世。方鳳「喜究心經世之務，凡所抒猷，鑿鑿可見諸施行」；⁵⁶ 黃潛「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⁵⁷ 吳萊「凡天文、地理、井田、兵術、禮樂、刑政、陰陽、律曆，下之氏族、方技、釋老、異端之書，靡不窮考」，⁵⁸ 胡翰從許謙授經，但他「持論多切世用，與謙之坐談誠敬小殊」。⁵⁹ 宋濂強調「真儒在用世」，⁶⁰ 「必也學為聖賢有用之學。達，則為公為卿，使斯道行；不達，則為師為友，使斯道明。如此而後庶幾也。」⁶¹ 方孝孺則明確表示：「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⁶² 他「以古聖賢自期，以經綸天下為己任」。可以說，明道致用已經成為該集團一以貫之的學術傳統。

其次，在政治上，該集團秉承中國傳統政治思想，重民本，倡仁治，以教化正俗為治國之先務。在這方面，以宋濂、方孝孺的思想最為系統也最具代表性。他們強調國以民為本：「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⁶³ 「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貴之，將使其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⁶⁴ 「如使立君而無益於民，則於君也何取哉！」⁶⁵ 基於這一民本思想，他們提出了愛民、富民、養民等一系列主張。宋濂認為：「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⁶⁶ 方孝孺與乃師的主張如出一轍，謂：「人君之職為天養民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眾也，人君果何以養之哉？惟用天之所產以養天民而

⁵⁶ 方士奇：《存雅先生遺集輯評跋》，轉引自方勇輯校《方鳳集》，頁192。

⁵⁷ 宋濂：〈金華黃先生行狀〉，《宋學士全集》，卷25，頁915。

⁵⁸ 胡助：〈浦陽淵穎吳先生文集序〉，《純白齋論稿》，卷20（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頁186。

⁵⁹ 清·永瑤等：〈胡仲子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1469。

⁶⁰ 同注7。

⁶¹ 宋濂：〈送從弟景清還潛溪序〉，《宋學士全集》，卷8，頁266。

⁶² 方孝孺：〈雜誠〉，《遜志齋集》，卷1，頁58。

⁶³ 宋濂：〈燕書十六首〉，《宋學士全集》，卷27，頁970。

⁶⁴ 方孝孺：〈深慮論七〉，《遜志齋集》，卷2，頁96。

⁶⁵ 方孝孺：〈君職〉，《遜志齋集》，卷3，頁102。

⁶⁶ 鄭楷：〈潛溪先生宋公行狀〉，《宋學士全集》附錄2，頁1692。

已」。⁶⁷ 他們所提出的輕徭薄賦，恢復井田制等措施，其用心都是為了抑制豪強兼併，緩解兩極分化，使廣大農民安居樂業，從而達至社會的安定。在為治之道方面，他們力倡施仁義，重教化，輕刑罰。宋濂說：「人主誠以禮義治心，則邪說不入；以學校治民，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先也。」⁶⁸ 方孝孺謂：「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⁶⁹ 他還進一步提出建立鄉族制度，利用其社會功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正俗教化的作用。⁷⁰

第三，該集團雖然在思想淵緣上與理學家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繫，但從其發展路向來看，是走向文學一派。創始人方鳳本身並無理學師承，他是以詩文創作上的成就奠定其開山地位的。第二代的黃潛、柳貫、吳萊等人，入方氏之門主要是學習詩文創作，故多以文顯。第三代的宋濂、王禕、戴良、胡翰等人亦大致如此。故胡應麟云：「婺中黃、柳同輩吳立夫、胡長孺、戴九靈（良）、王子充、宋潛溪諸子，皆以文章顯，而詩亦工，當時不在諸方下。元末國初之才，吾郡盛矣。」⁷¹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淵穎集》亦云：「（吳）萊與黃潛、柳貫並受業於宋方鳳，再傳而為宋濂，遂開明代文章之派。」均指出了這一文人集團偏重文學的特點。

作為一個師弟子間代代傳承往禪來續的文人集團，其在文學觀念和創作上自有其一脈相承的共同特色。在文學思想上，該集團以明道宗經為宗旨，有著非常濃厚的理學色彩。宋濂曾回憶從黃潛學文的情景：「及遊黃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為根本，遷、固二史為波瀾。二史姑遲之，盍先從事於經乎。』」⁷² 宋濂始終將黃潛的教誨奉之如圭臬，將宗經明道視作為文之根本。他說：「文者，道之所寓也。……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

⁶⁷ 方孝孺：〈甄琛〉，《遜志齋集》，卷5，頁173。

⁶⁸ 清·張廷玉等：〈宋濂傳〉，《明史》，卷182，頁3786。

⁶⁹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7〈陳野翁字說〉，頁233。

⁷⁰ 見《遜志齋集》，卷1〈宗儀九首〉，頁73-85。

⁷¹ 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236。

⁷² 宋濂：《宋學士全集》，卷7〈白雲稿序〉，頁226。

聖賢；聖賢既歿，道在六經。……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言文。」⁷³
 「文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文不系於道，不作焉可也。」⁷⁴ 方孝孺持論比他的老師有過之而無不及。針對士人重文輕道的風氣，他予以大力抨擊：「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以為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⁷⁵ 並作《文統》來糾正這種弊病。他在《答王秀才》一文中說：「凡文之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故聖人者出，作為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修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為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為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違乎此者，雖工不錄；近乎此者，雖質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儻常可喜之論，祛千載之積蠹，為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擯浮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遠且大者。」⁷⁶ 總之，該集團中人在具體文學主張上容或有不同，但在堅持明道宗經這一總的宗旨上是並無二致的。

該集團在創作上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散文方面。其總體特徵為根柢六經，融彙史傳，法度從容，平和淵潔，醇正典雅，雍容暢達。宋濂謂黃潛之文「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為體，佈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⁷⁷ 謂柳貫之文「春容紆徐，如老將統百萬雄兵，旗幟鮮明，戈甲焜煌，不見有喑鳴叱吒之嚴。」⁷⁸ 說的都是這種台閣之文的氣象。宋濂本人入明以前的文章，有論者指出「已有台閣之文的氣息」，⁷⁹ 《四庫全書總目提

⁷³ 宋濂：《宋學士文集》，卷7〈徐教授文集序〉，頁216。

⁷⁴ 同注45，頁240。

⁷⁵ 同注31，頁285。

⁷⁶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11，頁335。

⁷⁷ 同注57，頁916-917。

⁷⁸ 宋濂：〈故翰林待制……柳先生行狀〉，《宋學士全集》，卷25，頁912。

⁷⁹ 郭預衡：〈「有明文章正宗」質疑〉，《文學遺產》（2000.1）頁104。

要》謂「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其評論與宋濂對黃、柳文的評論幾乎如出一轍，足以說明他們的文章的確具有共同的特徵。方孝孺的文章稍有例外，四庫館臣謂其文「縱橫豪放，頗出入東坡、龍川之間」，並指出其原因：「蓋其志在於駕軼漢唐，銳複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揚蹈厲，時露於筆墨之間。」⁸⁰ 性格、氣質的不同造成了為文風格的差異，但就「醇正」這一總體特徵來說，方氏之文與他的前輩們並沒有根本的不同。

四、婺州文人集團與明初政治

明王朝創建及成立之初，在元末大動亂中遭到重創的農業經濟亟待恢復，農民需要休養生息，社會渴望安定；由於元代政治制度和思想統治的鬆懈所導致的社會秩序的破壞、倫理道德體系的崩缺，以及淺弱衰靡文風的瀰漫，都亟須重新加以整合和重建。堅持儒家正統學說，有著積極用世的傳統，同時又具有經世才幹的婺州文人正好適應了這一時代的需要，可謂風雲際會，一拍即合，他們登上明初政治舞臺一展其身手，可以說乃是歷史的必然。

早在朱元璋尚未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就曾詢問過李善長：「吾徐將軍，淮陰無以過。即安得留侯者？」⁸¹ 反映了他在軍事鬥爭即將取得全面勝利之時，迫切需要得到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建設方面人材的願望。元順帝至正十八年（1358），他的軍隊攻下婺州，即召見了宋濂。次年命知府王顯宗開郡學，又禮聘宋濂為五經師。至正二十年（1360），宋濂被徵至應天（今江蘇南京），授江南儒學提舉，尋改起居注，並教太子朱標經學，自此迄至洪武十年（1377）致仕還鄉，始終不離朱元璋左右。朱元璋得到宋濂的輔佐，真有如魚得水之感，他多次說道：「起居注宋濂，生於金華文獻之鄉，正學淵緣，有自來矣。」⁸² 「朕出自草萊，非兼備之才。蒙上天授命，位極兩間。凡生民休息，百神祀事，

⁸⁰ 同注3，頁1480。

⁸¹ 查繼佐：《罪惟錄》，卷8《啟運諸臣列傳·李善長》（四部叢刊本），頁1。

⁸² 宋濂：《翰林學士誥》，《宋學士全集》，附錄卷1，頁1615。

盡賴文武輔導以成之。……然文者，翰林院尚未有首臣。朕於群儒中選，皆非真儒人，各虛名而已。獨宋濂一人，侍朕十有九年，雖才不兼文武，博通經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規。」⁸³ 朱元璋的這些話恐不是虛譽之辭，而是由衷之言。宋濂為輔佐朱元璋也的確做到了殫精竭慮，鞠躬盡瘁。對此，方孝孺曾作過十分精當的評述：「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為言。是時群雄多嗜殺好貨，獨上禦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為學士，中嘗為國子司業，晚為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⁸⁴ 宋濂對明王朝政治、思想、道德、文化重建所作出的貢獻之大，的確無人能出其右，他被許為「開國文臣之首」，可謂名至實歸。

除了宋濂之外，王禕在朱元璋取婺州後即受召見，用為中書省掾「每商略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充而不名。」⁸⁵ 朱元璋曾對他說：「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⁸⁶ 洪武二年（1369）詔修《元史》，王禕與宋濂同入史局，並為兩總裁。同時入史局的還有胡翰、張孟兼等人。蘇伯衡、鄭滔等也入朝做官……婺州文人集團中人幾乎悉數成為明初統治集團的文臣。蘇伯衡曾以自豪的口吻描述婺州文人充斥朝中的情景：「前年秋，伯衡以非材忝教成均，會許先生為大司成，相與甚親且樂也。未數月而張君孟兼亦來為學錄。吾三人者婺人也，人已愛慕婺多士矣。及詔書招延儒臣纂修《元史》，而宋先生以前起居注來，胡先生以前郡博士繼來，王先生以漳州通守又繼來，相見益親且樂。三人者亦

⁸³ 宋濂：〈翰林承旨誥文〉，《宋學士全集》，附錄卷1，頁1616。

⁸⁴ 方孝孺：〈宋學士續文粹序〉，《遜志齋集》，卷12，頁366。

⁸⁵ 鄭濟：〈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皇明文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62，頁425。

⁸⁶ 同注85，頁425。

婺人也，人皆謂婺信多士友。」⁸⁷ 正如胡應麟所說：「國初聞人，率由越產，……諸方無抗衡者。」⁸⁸ 可以說，明初政壇、文壇已成為浙東文人的一統天下。

作為婺州文人集團第四代傳人的方孝孺，登上明初政治舞臺應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事實上卻經過了一番曲折。朱元璋曾兩次召見他，但終洪武一朝卻沒有重用他。第一次是在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經吳沉、揭樞的推薦，孝孺來到南京，接受朱元璋的召見。孝孺「陳說多稱旨」，⁸⁹ 並當廷做《靈芝甘露策》，朱元璋閱後大為讚賞，脫口而出：「異才也！」但朱元璋並未任用他，只是對太子朱標說：「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耳。」⁹⁰ 第二次是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孝孺應廷臣交薦再次赴京，朱元璋召見他後，道：「今非用孝孺時。」⁹¹ 只授了他一個漢中府學教授的職務。對朱元璋不用方孝孺，有後世史家認為是：「上方心在賞罰，未遑教化」。⁹² 這或許是原因之一。但筆者認為，更主要的是朱元璋目光長遠，有意為子孫後代儲備人材。有一事例可為佐證。洪武二十年（1387），孝孺叔叔克家因仇家構難，詞連孝孺，有司錄其家，械送京師。「太祖見其名，釋之。」⁹³ 令其奉祖母及妻子還裏。從這件小事亦可看出他對孝孺的特別關照。朱元璋臨終之際，「遺令先召孝孺」，⁹⁴ 正符合其將孝孺留待輔佐子孫的戰略考慮。建文即位後，孝孺以從九品的漢中府學教授被詔進京，被授以翰林侍講，明年又遷侍講學士，如此非常際遇不能不說和朱元璋的遺命有關。建文對孝孺十分倚重：「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辰前批答。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皆為總裁。……燕兵起，

⁸⁷ 明·蘇伯衡：〈送胡先生還金華序〉，《蘇平仲文集》，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明人文集叢刊本，1991），頁619。

⁸⁸ 同注71，續編卷1，頁341。

⁸⁹ 方孝孺：〈方先生小傳〉，《遜志齋集》，附錄郡齋舊刻（四部叢刊本），頁23-25。

⁹⁰ 明·焦竑：〈忠節〉，《玉堂叢語》，卷4（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37。

⁹¹ 清·張廷玉等：〈方孝孺傳〉，《明史》，卷141，頁4017。

⁹² 同注89。

⁹³ 同注91。

⁹⁴ 同注90。

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⁹⁵ 宋濂輔佐朱元璋，為文臣之首，並擔任太子朱標的老師；宋濂的弟子方孝孺又受到建文帝的尊寵、信賴，待之如師。以他為代表的浙東文人在朝中的主導地位，可謂一如洪武之時。

現在回頭來看朱棣誅孝孺十族一事，就不難理解了。明清時期不少學者視此事件為意氣之激使然，⁹⁶ 識見未免皮相。倒是明人倪元璐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他在為孝孺文集所作序中說：「先生以一言沉十族不悔，文皇帝以一怒族先生亦不悔，蓋皆以甚重其文章之故。」⁹⁷ 文章乃思想之載體。朱棣要鞏固用非法手段篡奪的政權，就不僅要誅殺方孝孺本人，禁絕他的文章，而且要把傳承他的思想、文章的弟子門生消滅乾淨。至此，傳承了四代、延續了一百餘年的婺州文人集團劃上了句號。朱棣誅方孝孺十族看似一個偶然事件，然而在它背後卻曲折地反映了歷史的必然，這就是以師弟子的傳承為紐帶的文人集團在當時的普遍出現，他們以群體組合的形式在政治、文學等領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⁹⁵ 同注 91。

⁹⁶ 明人錢士升的話可作為代表：「孝孺十族之誅，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於斷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顧。而萬乘之威，亦幾於殫也。」《皇明表忠記》，卷 8（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頁 533。

⁹⁷ 方孝孺：〈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序〉，《遜志齋集》卷首（四部備要本），頁 1。

Fang Hsio-ju and the Wu-chou Intellectual Group

Ouyang, Guang*

[Abstract]

Started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groups, based on teacher-student bonds and/or friendship bonds, continued to be forming abundantly, and exerted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fluences in the 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lives. The intellectuals living in such environments were predestined to be accustomed to it, with more and more obvious influences from their teachers, friends, and the groups themselves, which is what we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when study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period of time. Focusing on the idea, the present article gives a thorough survey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Fang Hsio-ju to the Wu Zhou intellectual group, the development and scholarship of the group, and the role of the group in early Ming politics, therefore furnishe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massacre of Fang's ten related clans by Ming Cheng-zu.

Keywords: Fang Hsio-ju, the Wu Zhou intellectual group, teacher-student bond, friendship bond, scholarship

* Ouyang, Gua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